

從政治經濟學 到國際政治經濟學

曾 怡 仁*

摘 要

本文主要目的是探討政治經濟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之間的關係。首先介紹什麼是政治經濟學，包括從研究議題以及方法論等方面來定義這門學科；接著討論從政治經濟學到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層次轉換時，後者可以從前者的研究方法、議題及理論得到怎樣的啟示，以及當這些方法及研究途徑被擴充延用時可能產生的問題。本文認為，雖然政治經濟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關係密切，但國際政治經濟學非僅是政治經濟學的簡單國際版，事實上它已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特色。

關鍵字：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學、國家理論

*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

壹、緒論

一九七〇年代以來，國際關係研究最顯著的發展之一，就是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簡稱 IPE）這門新興學科的出現，國內外各大學的政治系所，尤其是國際關係學門，均有開設這方面的課程。然而如同史坦力蘭德（Martin Staniland）所言：「目前學者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情形，就好比一個人想要喝光大海的水以避免自己溺死的命運」一樣，由於其為「新」，關於 IPE 的定義、研究範圍、研究取向與研究目標等問題，到目前為止學界仍未有共識。墨菲和圖斯（Murphy & Tooze）甚至悲觀的宣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學者間對於研究的議題（What to Study）已經有共識外，對於研究的方法（How to Study）卻少有發展」（Murphy & Tooze, 1991：1）。到底 IPE 做為一門新興的學科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呢？其僅是隨著國際重要事件（events）的發生與演變，為了應景才產生的？僅僅是研究客體的改變？還是因為傳統的主流國際關係研究方法本身出了問題，需要作調整甚至創新？¹再者，其在學科的定位上與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簡稱 PE）、²國際經濟學（International Economy）³、國際政治學（International Politics）⁴以及國際關係學（International

¹ 持類似看法的學者不少，包括 Stephen Krasner 與 Stefano Guzzini 等等。見 Stephen Krasner (1996: 109-110)。Stefano Guzzini 更明確地認為 IPE 是 IR 主流現實主義者對現實主義危機的回應。見 Stefano Guzzini, (1998, Chaps. 10-11)。

² 吉爾平（Robert Gilpin）在其名著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87)，就花了一整章的篇幅討論什麼是政治經濟學，似乎其認為 IPE 就是 PE 的國際版。

³ 史珮蘿（Joan Edelman Spero）教授就從國際經濟關係政治化的發展趨勢來討論 IPE 的內涵，其認為 IPE 有兩個主要研究課題：一是討論政治如何影響國際經濟關係的發展；另一是二次大戰以來國際經濟關係中的政治安排管理。參閱 Joan Edelman Spero (1990, Introduction)。

⁴ 大陸學者柳劍平就認為國際關係包括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關係，

Relation 簡稱 IR) 之間的關係又為何？到底 IPE 是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或者是國際關係的經濟學分析？或者是就國際經濟關係中的政治性因素作分析？最後，IPE 研究方法上面臨的問題是，對複雜的國際政經議題是否有可供操作的分析途徑？如果說自由主義、民族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是 IPE 基本的三種不同分析途徑，則是否有必要及如何可能整合？或者還是維持各說各話，強調開放溝通的態度即可？此外，IPE 研究應該採取行為主義實證立場的維持現狀取向理論，僅僅是對於現實國際秩序進行描寫與說明，還是必須追求規範性及理想性強的變革現狀取向的理論建構，將現存秩序的變革可能性視為理論目標？

當然，要釐清上述這些問題是一件困難的工作，而且也未必能得到答案，不同的 IPE 學者各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張，他們의思想和概念也各有所長。本文僅試圖以吉爾平 (Robert Gilpin) 一九八七年的名著《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中的看法作為引子，⁵從 PE 與 IPE 的可能關係這條線索來思考 IPE 的學科定位等相關問題，特別是針對研究方法的可能沿用方式及其可能產生的問題作探討。如果說 IPE 是 PE 的國際版，是「國際」的「政治經濟學」，那麼我們必須先進一步追問到底什麼是 PE？什麼是所謂的「政治經濟分析途徑」？這是本文第二節將要討論的問題；接著第三節將討論從 PE 到 IPE 的研究層次轉換，可以從 PE 的研究方法、議題及態度上得到怎樣的啓示，以及

而 IPE 就是研究兩者相互影響之問題，究其性質而言仍然屬於政治經濟學的範疇。而當以馬克思主義歷史整體觀為基礎，用利益分析的方法分析國際政治時，國際政治究其型態而言，除了過去我們稱為國際政治的「國際權力政治」外，還存在著「國際經濟政治」。見柳劍平(1998)。

⁵ 在書中吉爾平以兩章的篇幅 (第一章及第二章) 介紹什麼是政治經濟學，雖然作者並未明言 IPE 就是 PE 的國際版，但毫無疑問，兩者間的關係必定是相當密切的。

其擴充沿用時可能產生的問題；最後，第四節為結論，將總結採用從 PE 到 IPE 這條觀察線索對 IPE 研究的侷限和可能發展。基本上，本文認為不論是 IR 或 IPE 的學科發展均是受到政治學研究方法或者方法論發展的影響。

貳、什麼是政治經濟學？

不同的研究者對於什麼是政治經濟學（What is Political Economy？）各有不同的看法，各學者所稱的政治經濟學並不見得是同一內涵。基本上我們可以將其觀點分成三大類：第一、認為 PE 原本就是經濟學的古典時期名稱，因此當代的 PE 就是反對十九世紀末葉以來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太強調量化、價值中立與排除非經濟因素探討的研究方法，而主張回復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態度。第二、從研究議題領域來對 PE 作學科定位，認為 PE 主要就是在研究政治與經濟，特別是國家與市場間的互動關係。至於國家與市場之間如何互動以及該如何互動則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包括經濟自由主義、經濟民族主義（重商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等三種不同意識型態的觀點。也因而並沒有統一的政治經濟學，而是有許多的「政治經濟理論」。第三、從研究的方法著手，認為 PE 不僅僅是一個研究議題領域，而是有其獨特的方法論。尤其指的是以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特別是新古典經濟學）來研究傳統政治學的研究課題，包括政治行為和政治制度等等。理性選擇理論和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一、PE 就是回歸新古典經濟學以前的研究態度

有些學者從學科史的演進來看，認為政治經濟學原本是經濟學的古典時期名稱，當時經濟學學者的著作都稱為政治經濟學，如薩伊的《政治經濟學概論》（1803）、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馬爾薩斯的《政治經濟學原理》

(1820)、以及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對社會哲學的若干運用》(1848)等等，甚至批判繼承古典傳統的馬克思，也分別於1859年和1867年發表了《政治經濟學批判》與《資本論》第一卷，而後者的副標題仍然是「政治經濟學批判」。這種情形要到1890年，新古典學派的代表人物，微觀經濟學的奠基者和劍橋學派的創始人馬歇爾才將其著作名為《經濟學原理》。從此，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很少有人用「政治經濟學」來指稱自己的學說，同時政治與經濟研究分離了，西方經濟學變得較注重經濟現象的實證分析，成為所謂的「純經濟學」或「經濟科學」。相對地，一提到「政治經濟學」就會聯想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因為許多左派學者仍繼續稱其研究為「政治經濟學」。然而受到冷戰的影響在西方卻又常將馬克思主義視為一種革命理論或者意識型態，也就是給政治化了，而忽視其可能的學術貢獻。這種情形要到二十世紀六、七〇年代以後，隨著冷戰的和緩，以及國內與國際層次政治問題的經濟化與經濟問題政治化的發展趨勢，學者才開始檢討忽略政治與經濟互動關係的研究之缺失，質疑在智識上嚴格區分政治學與經濟學的正當性(Frieden & Lake, 1995: 4)，並且也較願意與馬克思主義學術傳統進行對話，特別是七〇年代受到新馬克思主義有關「國家相對自主性(state relative autonomy)」概念的影響，豐富了PE及IPE的研究。

事實上，如果從研究議題上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雖然也會提到國家與市場的互動關係，不排斥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角色研究，但此並非其重點，其主要還是在於探討資本主義市場本身如何運作及其功能，包括商品生產及交換、價格的形成、勞動價值論、生產再生產和分工的效率等等，似乎是比較偏當今經濟學的研究議題。同時十九世紀以前是屬於自由資本主義的年代，國家在市場中的職能是有限的，因而將政治和經濟分離看待是可能的，正如卡帕羅索和李邁(James A. Caporaso & David P. Levin)所言，古典經濟學家主要在於闡述兩大核心觀念，即經濟的可分離性和經濟的第一性問題(the separability of the economy and the primacy of the economic

sphere) (Caporaso & Levine, 1992: 33)。那麼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政治」又代表什麼意涵呢？一般認為古典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不是之前的「家庭經濟管理」或「莊園經濟」，而是涉及整個國家範圍的經濟問題，也就是說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使用「政治」兩字的主要用意，是指一種研究範疇的空間概念。因此，所謂 PE 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回歸的看法，並不是指研究議題或研究範疇的相似。如果說當今 PE 從古典政治經濟學能夠得到什麼啓示的話，應該在於重新思考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開放研究態度上。由於古典政治經濟學到了十九世紀後半葉發展成所謂的經濟科學（新古典經濟學），太強調實證量化的非歷史研究方法，主張價值中立、排除非經濟（政治）因素的探討，以及接受個人主義式的理性自利經濟人假設，引起當代一些 PE 學者的不滿，認為 PE 研究應回歸新古典以前時期的特徵，這些包括：第一、其研究內容可同時涵蓋規範與經驗的層次；第二、可結合結構與行爲的分析層次，並且不排斥國家或政府對市場活動影響之研究；第三、可嘗試從歷史的發展系絡中來解釋現在，特別是資本主義發展史中的積累問題；最後，強調國際層次與國內層次互動關係之研究。在所有古典政治經濟學者當中，這些特徵尤其可以從自由主義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以及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發現，如前者的《道德情操論》、《法律、國家歲入和軍隊》與《國富論》以及後者的《德意志意識型態》、《資本論》和《哲學的貧困》等等，他們均未將政治研究或歷史研究從其經濟理論中排除。正如學者韋格 (Norman J. Vig) 所指出的，PE 並非一門固定的學科，很難對其作一周延的定義，只能從其研究的特徵來說明什麼是 PE (Vig, 1985: 6-7)。當然嚴格來講，上述幾點特徵也僅具宣示立場的意涵，至於如何操作可依學者不同的經驗與興趣而有所不同。

二、PE 就是研究國家與市場的互動關係

另一些學者，包括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吉爾平 (Robert

Gilpin)，從研究議題著手給 PE 下了一個經典的定義，認為 PE 就是探討國家與市場互動 (mutual interaction) 關係的科際整合學科 (Gilpin, 1987: 8)。過去將政治學 (主要研究國家機關如何統籌一切資源和權力分配) 與經濟學 (主要研究價格機能和市場力量如何決定經濟的結果) 視為兩個獨立的學科，已不足以充分解釋當前複雜的政經發展問題。而 PE 研究內容就是涉及到，國家以及它的政治作用如何影響生產和財富的分配，尤其是政治決策與政治利益如何影響經濟活動分布，以及這種活動的成本及利潤的分配等等方面；反之，這些問題也涉及到市場和經濟力量如何對國家和其他政治行動主體之間權力與福利的分配施加影響。簡言之，單單國家或市場都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他們的相互作用，相互關係及其周而復始的變化 (Gilpin, 1987: 9)。

然而除了將 PE 的研究議題領域清楚界定外，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對國家與市場的互動關係進行實際的研究？是否有一套標準的可依循的操作化研究程序？針對此問題，吉爾平認為有三種不同的基本學派，即經濟自由主義、經濟民族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的不同觀點 (Gilpin, 1987: 25)。吉爾平進一步指出，此三種學派不應稱為「理論」，而僅是一種「意識型態」，因為第一、這些思想均建立在對人以及對社會的各種假設基礎之上，而此是無法通過經驗加以驗證，例如經濟自由主義關於理性個體的假設即無法予以肯定或否定；其次，某一種思想的錯誤預言總可以經由引入對某一特定假說的分析而得到辯解，例如列寧發展「錯誤意識」的概念以及「帝國主義」的理論對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必然崩潰和無產階級革命的錯誤預言所作的辯解即是；最後，這三種思想觀點所提出的問題是不同的，而各自所要追求的目的也不相同。例如經濟自由主義強調成長、重商主義重視國家利益、而馬克思主義則追求分配正義 (Gilpin, 1987: 25, 41-42)。

另一 PE 學者史坦能特 (Martin Staniland) 對「理論」就採取比較寬鬆的定義，認為只要能夠有系統地說明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關係，我們就承認它是政治經濟學理論。有些學者

認為兩者間是一種因果關係（決定論），有些學者則認為是相對關係（互動論）（Staniland, 1985: 5-6）。無論如何，學者是否將他們的理論稱為政治經濟學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必須提出經驗性的解釋。然而，史坦能特也認為採取決定論或互動論的觀點，除了涉及我們對社會整體運作情形的了解與評估外，也必須問我們想要從理論當中得到什麼（Staniland, 1985: 7-8）。如此，它必定牽涉到意識型態的價值判斷問題。例如，對社會工程師或者革命份子而言，他們所希望得到的是一個明確簡要的行動綱領，因此自然會比較傾向決定論的看法。綜合上述吉爾平與史坦能特的觀點，我們可以說現在並沒有統一的政治經濟學，而是有許多的「政治經濟理論」，只要一項理論能系統的說明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關係，我們就承認它是政治經濟學理論（表1）。

表 1、政治經濟學三種意識型態之比較

參數 \ 主義	經濟自由主義	經濟民族主義	馬克思主義
主要行為者與利益歸屬	以個別消費者 和廠商為主、 利益歸屬於個人	國家是重要行為者、且私人利益和國家利益衝突時，國家利益優先	階級是主要行為者、且利益歸屬於階級
政治與經濟關係	以經濟為主、 政治為輔助性 工具	政治為主、市場須 服從國家利益	經濟為基礎結構、 政治則為上層結構
世界經濟交往對國際和平關係的影響	肯定的看法： 國際貿易是互惠有利，且經由交流有助於彼此了解，降低敵意	保留的看法：國家間經貿競爭可能引發衝突，無法保證和平	負面的看法：列寧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資本主義國家間最後會發生衝突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三、PE 就是指政治的經濟分析

相對於上述從研究的議題領域來定義什麼是 PE，以及 PE 的研究方法可以多元的包括經濟自由主義，經濟民族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等多種不同的意識型態觀點，第三類的 PE 學者特別強調的是其方法論的特質。他們主張 PE 並不是講政治與經濟現象之間如何相互作用，而是試圖以新古典經濟學研究經濟行為和市場制度的假設、邏輯和理論來研究政治行為和政治制度，這其中理性選擇理論和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⁶

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受到行為主義科學研究的影響，理性選擇理論學者認為，政治市場如同經濟市場一樣，也存在權力資源稀少性的問題，而政治人物不論是選民、政黨、民意代表、或者是政府官僚都是理性自利的利益極大化者。也就是說，經濟（作為市場交換、生產、消費）和政治（作為政治交易、權力、權威關係）只是同一方法（即經濟分析途徑）的兩個具體應用而已。如此，政治是指個人藉以滿足其偏好（而這些偏好又是相互依賴的或公共的物品）的那些制度與過程。這方面的研究包括唐斯（Anthony Downs, 1957）對投票行為；賴克（Willian Riker, 1962）對政治聯盟；和奧森（Mancur Olson, 1965）對政治團體內部行為等之研究。

理性選擇理論的出發點是行動者，行動者根據自己的偏好等級（hierarchy of preferences）行動，但這一理論並不關心這些偏好是什麼，或者它們是怎樣形成的。該理論只考慮到來自外部環境的限制，而沒有顧及存在於行動者本身的限制，認為我們只要知道行動者的偏好，就可以對行動者最優地適應環境的程度做出判斷。事實上，這是一種套套邏輯的論述，認知心

⁶ 有關新古典經濟學和 PE 研究之關係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是研究市場失靈（包括公共財、外部性、產權以及自然獨占或寡占的情形）而政府介入處理所可能產生的問題；第二、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方式來研究政治行為或政治制度。

理學的有限理性或程序理性 (bounded or procedural rationality) 觀點以及經濟學者西蒙 (Herbert Simon) 對此作了修正，認為由於行動者計算能力的有限性以及信息的不確定性，一旦有令人滿意的選擇，行動者就會停止進一步尋找資訊，這種結果可能不是最優的，只是最低限度的使行動者滿意。可以看出有限理性強調行動者的決策過程，而不是決策的結果。此時，新制度經濟學研究也有了初步的成果，該理論強調經由創設制度可以引致合作行爲、降低交易成本、減少不確定性、爲生產、交易提供追求利潤的組織基礎。而制度的起源是行爲者間偏好的聚合反映，制度的變遷則是行爲者的偏好改變或者產品相對價格的改變。由於受到認知心理學的批評與新制度經濟學的啓示，到了七〇年代末期一些傳統理性選擇理論家漸漸認識到原有理論的不足，轉而尋求制度的因素來解釋政治現象，繼而發展出理性選擇制度學派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該學派同時強調偏好與制度的作用，偏好提供個人行動的動機，而制度則提供了因果解釋的背景，只有當個人行動的理由是確定的，而且促使行動產生的理由的制度結構條件得到解釋時，理性選擇才能提供對政治結果的因果解釋。甚至一些其他研究制度的學者認為，應該考察偏好是怎樣由行動者所處的制度和社會結構產生的，因爲制度既限定什麼利益追求是可能的，也結構性地提示了個人的利益，社會學制度主義和歷史制度主義就是持這種看法。八〇年代以後新制度主義儼然成爲政治學中的顯學，其影響了政治發展民主憲政體制的選擇、東亞發展模式的新國家理論 (Statist Theory)、中國大陸政經改革的制度選擇以及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新自由制度主義等等之研究。

參、從 PE 到 IPE

一、IPE 是研究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互動關係的交叉學科

一些學者認為 IPE 如同 PE 一樣，主要也是在處理政治與經濟，或者更具體的說是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係，然而擴大到國際層次就必須同時處理國際政治、國內政治、國際經濟與國內經濟過程四者之間的交互作用。毫無疑問，在變數增加的情況下，試圖提出可供操作的分析架構也就更形困難。我們都可以接受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是處於一種互動的狀態，然而馬上面臨的問題是，到底何者的影響力較大？何者先起影響作用？如同 PE 一樣，不同學者的答案也會涉及意識型態的不同觀點。IPE 裡的自由主義、現實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等三大學派，僅是一種認識工具而非分析架構。針對此問題吉爾平曾提出一個簡略的看法：

「就短期而言，權力的分配情形和政治體系的本質決定了財富分配和生產的架構。不過，就長期而言，經濟活動的定位及有效與否可能改變，甚至粉碎現有的政治體系。而政治體系的轉變連帶也會導致經濟關係的改變，顯示政治還是整個體系當中最具決定性影響力的因素。」(Gilpin, 1975: 43)

這僅是許多可能看法中的一種，是(新)現實主義的觀點。但吉爾平仍未清楚說明為什麼政治在短時間內會佔優勢，而經濟則需在較長的時間過後才會發揮它的影響力？而所謂的「短期」與「長期」的劃分依據又為何？以及「短期」又是如何過渡到「長期」的呢？又為何「政治」是最具影響力的決定因素 (Staniland, 1985: 109-110)？同樣這種情形也常在自由主義學者的觀點中出現，如主張「國際經濟決定了國際關係的整體互

動以及各國所採取的政策，不論國內政治情勢如何改變、統治者的統治技巧如何、以及外國政府是否橫加干涉，國際經濟都可以改變國際情勢及各國政策（Johnson, 1970: 24，轉引自 Staniland [1985: 106]）。」甚者更期待「就長期而言，經濟力量必定壓過政治力量，也因此人類終將組成世界聯邦政府來解決共同面臨的經濟問題，除此之外再也沒有更為理性的辦法（Johnson, 1970: 24，轉引自 Staniland [1985: 106]）。」毫無疑問，上述這些看法都僅能視為一種具意識型態的主張，甚至連分析架構都稱不上。

相較之下，新自由主義互賴理論學者基歐漢與奈伊（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S. Jr. Nye）曾試圖提出四種先後次序清楚的研究步驟（1.經濟過程變化、2.全球權力結構變化、3.特定問題範圍的權力結構發生變化以及4.國家權力受到國際組織影響而發生變化）來解釋國際關係的變化（Keohane & Nye, 1979: 38）。他們主張應優先考慮技術發展或經濟互賴程度增加所可能帶來的國際情勢變化，如果仍無法作充分的解釋，接著再考慮全球權力結構的可能制約作用，然而如欲預測變化則需更精確觀察特定問題領域內的權力結構變化情形，最後兩位學者認為國際組織的作用的解釋力最弱，地位也最不重要。然而基歐漢與奈伊的分析架構也沒有清楚說明步驟優先次序的原因，他們的看法也僅是許多種可能性之一，其有效性必須經由更多的具體個案研究來檢驗。這也可說明為何後來一些互賴理論的學者，包括基歐漢本人，很自然地轉向強調議題領域的國際建制理論（International Regime Theory）研究，其目的就是要讓複雜的互賴現象具體概念化，如此也才有助於學術研究的累積。

然而三種不同意識型態觀點（經濟自由主義、經濟民族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在 IPE 的研究發展中常是相互影響相互補充的，而非完全對立不可交融。例如，互賴理論並不是像古典自由主義原型那樣的泛經濟決定論。互賴理論認為經濟上的互賴雖然對政府的行動自由構成限制，並且經由民間和政府的管道影響各國的國內政治，不過政府也非毫無做為，如果他們能夠善用其資源及談判技巧，也可以爭取到最大的國家利益。此

外，互賴理論學者也承認互賴並不是每個國家都能平均地分享到貿易的利益，依著互賴的敏感度（sensitivity）和易脆性（vulnerability）程度，每個國家對權力的反應和利益的獲取是不一樣的（Staniland, 1985: 116）。簡言之，互賴理論可說是試圖結合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觀點，因而比古典自由主義更強調政治與經濟的互動以及國內與國際層次交互影響之關係研究。同樣地，新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論者強調，霸權國必須以獨自承擔公共商品的成本來換取各國對其支配的國際秩序的認同，而新自由主義的後霸權國際建制理論雖然認為國家間的合作利益需以各國為衰落中的霸權國承擔維持國際秩序的成本為基礎，然而一開始霸權國家對於國際體制的建立則是必要條件。由此可見 IPE 的新自由主義和新現實主義之間並非水火不容，而是在許多地方的思考邏輯是相通的。

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依賴發展論（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ory）以及世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 Theory）也是試圖進一步結合現實主義的權力觀點和馬克思主義的結構觀點，而朝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向發展。這主要是現實主義從過去的關聯性權力（relative power）轉為較重視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結構性權力（structural power）觀點的研究，而馬克思主義也從工具主義的國家立場開始接受國家具有相對於經濟基礎結構的自主性看法。例如，依賴理論認為許多邊陲國家經濟不發展並不是如現代化理論所稱，是由於本身內部因素造成的，其主要的原由乃是由於核心國家所支配的資本主義分工體系，經由不平等的交換關係形成的，而邊陲國家的政權僅是跨國資本的買辦代理人。如果說依賴理論對國內外關係的討論較偏重國際因素，而且認為政治體系的運作是受到經濟基礎的影響，這種立場看似是一種偏泛經濟決定論的觀點。然而，核心國家對邊陲國家的剝削既然不是存在於傳統馬克思主義所認為的生產過程，主要是在於不平等的交換過程，而後者正是由核心國家透過政治權力的展現而創設和維持的，如此依賴理論的研究也就不可避免的政治化了。此外，依賴理論學者對於邊陲國家如何擺脫低度發展的主張，不論是推

行溫和的進口替代發展策略或者是進行激進的社會主義革命，也都有著拉丁美洲民族主義的排外情感，特別是反對美國經濟帝國主義。後來對其修正的依賴發展理論（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ory）由於受到新馬克思主義有關「國家相對自主性（state autonomy）」概念研究的影響，認為邊陲地區的國家機器並非僅是跨國公司的工具，而是可能具有相對於統治資產階級的自主性與能力（capacity）來結合跨國資本與本土資本、本土勞工以及技術官僚，形成三角聯盟關係（triple alliance）以求取國家的發展，東亞的新重商主義與發展導向型國家模式（developmental state）就是在此背景下的進一步發展。這樣依賴發展理論的焦點就從國際經濟的結構因素轉向國內的政治因素來做探討。如此，其研究方法必然是反對宏觀的大理論，而主張重視個案研究與歷史分期的「歷史結構分析（historical-structural analysis）」研究方法。

在新馬克思主義傳統中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毋寧更值得 IPE 甚至 IR 的研究者關注，⁷因為不論是依賴理論或依賴發展論均被視為具區域性，僅適用於南北關係的探討，而忽略北北關係與東西之間關係的研究，而世界體系理論則更具全面性。此外，依賴理論或依賴發展理論常被當成是一種與主流的現代化理論對立的經濟發展理論，相較之下，世界體系理論對於國際關係研究的影響更大，涵蓋面更廣，更有可能與主流的 IR 學者對話。例如，華勒斯坦認為當代資本主義體系與十六世紀之前的世界帝國體系最大的不同點之一就是，前者的生成發展必須以政治上不存在攬括一切的政治結構，而是以多重國家政治體系的存在為前提（Wallerstein, 1974: 348-349）。也就是同時存在世界經濟體系

⁷ 吉爾平就將世界體系理論與劉易斯的二元經濟論和金德伯格的霸權穩定論一起稱為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最有影響力的三大理論。見 Gilpin (1987: 81)。克瑞尼和亞曼維更認為世界體系理論的觀點是國際政治經濟學中最有前途的分析架構，因為其既克服了經濟主義的侷限性，也克服了歷史主義的研究侷限性。見 Crane & Amawi (1991: 142)。

(world-economic system) 與國際國家體系 (international state system)，並且這兩個體系是通過一種共同的邏輯——即資本積累——來聯繫的。此外，世界體系理論認為，國家是在世界體系的框架內被創造出來的制度，是反映了世界經濟中階級力量的需求，因而自從產生以來就一直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政治實體（國家主權有限說），而是存在於有等級性權力關係的國家體系當中（Wallerstein, 1974: 33），裡面的規則不是根據一致同意的原則來制定（如自由主義契約論所宣稱），而是由強國將一些限制性準則強加於弱國，然後在強加於彼此之間（Wallerstein, 1974: 57）。再者，世界體系理論者以為國家體系所遵循的原則是權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但與現實主義者將權力均衡歸因於政治或軍事因素不同，在世界體系理論者看來，權力均衡主要是根植於資本積累的動機。每一個國家都希望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獲取最大利潤，因而都力圖運用自己的國家機器來促進資本積累，這樣就會導致國家之間的競爭甚或衝突戰爭。由於每一個國家又都處於國家體系之中，彼此會進行聯盟以阻止某一個國家控制其他所有的國家，從而導致體系中的權力平衡（Wallerstein, 1974: 60）。最後，華勒斯坦認為就像世界經濟體系在不斷的周期性運行過程當中會出現壟斷一樣，國家體系在其運行過程中也會出現較長的周期性「霸權變動」，也就是在大國之間的競爭中，一個大國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將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甚至文化上的原則和意願強加於國家體系中。然而霸權也必須為此付出代價，當所付出的代價超過其所獲時，霸權國家就會衰退，繼而出現霸權戰爭並進入另一次的周期性變化（Wallerstein, 1974: 43）。新現實主義學者吉爾平後來也承認，其霸權穩定理論就受到世界體系理論有關長周期霸權研究的觀點影響。

毫無疑問，上述華勒斯坦有關國家體系的運作邏輯、有限國家主權的概念、權力平衡立基於資本積累動機的看法以及長周期霸權循環之觀點等等，不僅結合了政治與經濟的研究，成為 IPE 裡的主要議題，也對傳統國際關係研究中的主流思想提出了挑戰。在冷戰期間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一直為兩大主流學派

所支配，就是現實主義 (Realism) 或新現實主義 (Neo-realism) 與自由主義 (Liberalism) 或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而馬克思主義與新馬克思主義是被排斥的。然而，儘管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存在著各式各樣的差異，彼此之間也有著共通性，兩者都是在現存的國際體系框架內論證國際體系的合法性和發展，或者從解決現存國際體系面臨的問題著手，因而被學者考克斯 (Robert Cox) 稱之為問題解決理論 (problem-solving theories)。相對地，與 IR 這兩種主流理論不同，華勒斯坦與其他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如包括新葛蘭西學派和歷史社會學分析學派，都是從歷史的和批判的角度來分析國際體系，而被歸為批判理論 (critical theories) (Cox, 1995: 31-32)。然而新馬克思主義理論要等到一九八〇年代末期以後，興起所謂的第三次國際關係研究大辯論時，⁸才被主流的國關學者接納並展開對話，⁹也因此我們可以看出 IR 與 IPE 學科範疇存在著重疊性。

二、IPE 研究是對國際政治進行經濟分析

在 IPE 裡以經濟學方法來分析國際政治者，可以新現實主義霸權穩定理論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處理國際公共財提供問題以及探討後霸權國際秩序的新自由建制理論

⁸ 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三次大辯論即是：第一、二次大戰以前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辯論；第二、七〇及八〇年代以後的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辯論、第三、八〇年代末期一來的實證主義與后實證主義之辯論。然而也有學者稱為四次大辯論，即多了五〇及六〇年代的傳統主義（將第一次辯論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合攆）與受行為主義研究方法影響的科學主義（如博奕理論與系統論）間之辯論。

⁹ 事實上第一次大辯論時的二〇、三〇年代，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帝國主義理論就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興起原因及如何重建戰後世界秩序等問題就提出了不同的見解；而第二次大辯論時的七〇、八〇年代，新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世界體系理論，也就國際體系的性質等問題提出了許多不同於新現實或新自由主義的觀點。然而卻都遭到主流國關學者的忽略，甚或排斥。

(International Regime Theory) 研究為代表。主流的觀點均將霸權穩定論與沃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並列為新現實主義 IR 理論，然而兩者的「新」義卻是不太相同。以研究方法來看，沃爾茲的國家構成國際系統，國際系統又反過來制約國家行為的結構說法與微觀經濟學對企業和市場關係的分析相似。眾多的企業組成了市場，而市場卻反過來用競爭機制這一「看不見的手」來左右企業行為。但就其研究內容而言，沃爾茲仍是以權力政治為研究的中心，對國際經濟的論述並非占主要的地位，因而其仍屬傳統 IR 研究範疇。相對地，霸權穩定理論是從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互動的關係來展開研究的。其理論核心是認為，國際政治權力結構決定國際經濟秩序與利益分配，特別是在無中央權威的國際社會裡，霸權的存在是自由經濟體制繁榮發展的必要條件。如此，霸權穩定論擺脫傳統現實主義單純權力政治的分析框架，以政治與經濟的綜合角度來研究國際事務，因而成為 IPE 的研究範疇。

除了論述霸權與國際自由經濟秩序之間的關係外，霸權穩定論亦認為兩者間的互動機制在於國際公共商品的提供問題上。針對此問題霸權穩定論者常採納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來說明為何霸權國願意提供國際公共財，以及霸權國為何衰退的原因。吉爾平就以經濟學者奧爾森 (Mancur Jr. Olson) 集體行動邏輯的「白搭便車 (free rider)」概念以及邊際成本收益分析來作研究。吉爾平認為，取得其他大國對國際秩序的認同是霸權國家所得到的收益，而提供國際公共商品 (如自由貿易或穩定的貨幣體系) 與容忍「白搭便車」則是霸權國家需付出的成本代價。由於這一成本支出是從霸主國的經濟剩餘中扣除的，因此其政治、軍事以及經濟上的優勢至關重要。然而霸主國的這些優勢又是同它所建立的國際秩序息息相關，是從其他國家對它的認同和接受其領導中得來的。一旦霸主國從其國際秩序中得到的收益漸漸減少，並下降到不足以抵銷為維持國際秩序所付出的成本時，霸權也就開始衰退了，進而引起國際經濟秩序的不穩定。

如果說新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理論觀點強調的是霸權國

1. 現實主義
2. 自由主義
3. 霸權利益
4. 得到大國
5. 認可
6. 程序

對國際政經秩序的重要性，則國際建制理論更關切的是霸權的衰退是否會導致國際政經秩序的混亂。基歐漢沿用寇斯（R. H. Coase）和諾斯（Douglass C. North）等經濟學家所發展的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來說明後霸權年代各主要大國之間仍會維持原先由美國霸權所建制的秩序來進行合作。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經濟行為者基於理性自利動機的成本效益考量，會去創設制度以求降低彼此間經濟活動的交易成本。制度是一種遊戲規則，它具有提供資訊、確保契約履行以及降低不確定性等之功能。在國際社會裡也是一樣，由霸權國所建制的秩序能夠使國與國之間擺脫囚犯的困境，形成可預測的多次賽局交往活動，使得不確定性及談判成本降低，進而促使合作發生。雖然霸權的存在有利於建制，但霸權的衰敗卻不必然導致建制的瓦解，除非新創體制的獲益大於所付出的設立成本代價。

我們可以發現不論是霸權穩定理論或者國際建制理論的研究都是因著美國的國家利益來思考的，這些學者所擔心的是美國的霸權地位是否喪失？該如何繼續維持其霸權地位？如果美國的霸權地位漸漸式微該怎麼辦？二次戰後美國以其強大的軍事及經濟實力凌駕於其他所有國家之上，這一現象也深刻的影響了社會科學，包括 IR 與 IPE，對什麼是最緊迫的問題，什麼是處理它們的最恰當方法的界定。然而正如史翠吉所批評的，國際建制理論所展現出來的世界是被嚴重扭曲的，理論內涵過於籠統含糊，並且忽視實際情況中的動態因素。更糟糕的是其充滿了美國中心觀的特定價值內涵，以及偏好維持現狀的傾向（*status quo*）（Strange, 1982: 480），並沒有進一步追問現存秩序下是誰獲利。因而以新古典自由經濟學的概念或方法來研究國際公共財或國際建制問題，並不表示這些理論就僅是屬於自由主義的觀點。如鄧肯史耐德（Duncan Snidal）就認為所謂的「國際公共商品」是霸權國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提供的，如果其他國家能從中得到什麼好處的話，那也祇是一種溢出效果而已（Snidal, 1985）。此外，許多所謂的「國際公共商品」並非具有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的性質，如北約集體安全保障對會員國而言是俱樂部商品，對非會員國而言就是他人的私

人商品。同樣地，國際建制中的規則、規範、原則和決策程序可以是由強權國家所訂定的遊戲規則。如此，較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圍繞著霸權穩定議題或者國際建制議題，甚至當前熱門的全球治理議題，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識型態觀點，自由主義僅是其中之一。

三、IPE 研究應如美國西部大草原的開放：以史翠吉的觀點為例

自八〇年代以來 IPE 研究雖然呈現了蓬勃發展的景象，但卻往往淪為各說各話沒有交集的狀態。上述兩種主流學者關於 IPE 學科研究的觀點多少就是試圖解決這個問題，然而並不是很成功，仍均存在著問題。雖然吉爾平將當前的 IPE 研究約略歸為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以及新馬克思主義等三種不同意識型態的觀點，而其自身則選擇新現實主義的立場來分析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然而多數其他 IPE 學者在嘗試使用一個理論或研究途徑來解釋這個世界的所有現象時，均不願意承認其持有特定的意識型態，反而常批評他人的觀點才是具有意識型態。所以現時 IPE 的發展應先促使三種意識型態彼此間相互了解，英國學者史翠吉 (Susan Strange) 以為做法之一就是回歸「價值」本質的研究，特別是「價值」差異的認識。這又可分為兩部分：首先，史翠吉認為人類社會的形成均是對四個不同目標價值（安全、財富、自由與公平）的偏好與選擇，不同的價值排序並非是命定如此的，也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取決於活動其中的行為者彼此經過長時間協調互動的實際經驗累積而成的。當然其中權力因素的作用仍然是主要的，但這種權力不是傳統的聯繫性權力 (relative power)，即甲迫使乙去做或許他本來不願意做的事，就是甲對乙有權力；而是一種結構性權力 (structural power)，就是形成和決定全球各種政治經濟機構的權力，各國及其政治機構、經濟企業、科學家和專業人員都不得不在這個結構裡活動 (Strange, 1988)。因此 IPE 研究的基本

問題就是探求，誰（who）經由使用什麼權力手段（how）來取得（這四項價值中的）哪些價值（what）。

其次，研究者本身必然也具有自身的價值偏好與排列選擇，或甚至主張某種特定的社會類型是較可取的，但不意味著自己所說所言必然是顛仆不滅的真理。有鑑於此，IPE 研究者須具備敏銳的「價值敏感度」，而「為什麼別人的看法會與我不同？」反倒是一個更值得思考的問題：

重視價值的研究反而是在避免落入意識型態的陷阱，釐清研究者自己與其他學術社群成員彼此所持價值的差異為何，為什麼他們偏好於某種類型的制度安排做為世界經濟的管理，而非採取其他的類型來安排。（Strange, 1983: 209-210）

釐清價值的作用在這個百家爭鳴的 IPE 領域裡，能突顯彼此間可以談論的中心議題為何？或者可以理解理論間差異的原因為何？這將有助於 IPE 本質的思索及理論研究的成果積累。

除了對「價值」的強調外，史翠吉也主張 IPE 研究應注重道德哲學的思考。問題的解決固然重要，也值得研究者挖空心思去鑽研，但是「人類社會秩序是怎樣的？」、「人們如何解決他們彼此間的衝突？」以及「人類社會究竟應該如何？」等等這樣的哲學性問題釐清後，我們才可能知道願意付出怎樣的代價以求達到怎樣的目標價值。IPE 的研究就某種意涵而言是與此相似的，只是其關注的是一個全球範圍的社會（Strange, 1988: Ch.1）。在當前全球結構與屬性改變的時候，從哲學層次思考作為 IPE 研究的起點，將可去除「國家中心主義」的傾向以及意識型態的堅持，而有助於掌握全球體系所發生的問題（Strange, 1996: 171-172）。

針對 IPE 應該何去何從？這令人感到茫然與困惑的問題，另外一些主流學者以為問題在於這門學科不夠科學化，而

主要是導因於缺乏一般性理論與規格化研究途徑的共識上。尋求明確的標準答案是人類自啓蒙運動以來就深信不疑的科學態度，此外，在實證主義研究精神的影響下，社會科學的發展也傾向於可重複操作檢證的研究途徑，特別是以美國爲首的一些 IPE 學者努力的引進經濟學的概念與研究方法來研究國際政治以求達成學科科學化的目標。然而這樣的「經濟學帝國主義」做法可能會讓 IPE 的研究者走上相同的道路及達到想當然爾的目的地，而將 IPE 這門學科的發展導向偏狹的方向，因而扼殺了其他的可能發展。自上個世紀以來，類似西部大草原的社會科學領域，在一連串的圈地運動下逐步地區隔各個獨立且排外的領域，而名之爲學科的分工化與專業化，然而卻也導致不同學門研究者之間沒有對話的空間甚或聆聽的能力，更不用說強調學科的專業分工有可能造成對事實的扭曲理解 (Strange, 1984: 7)。針對此問題史翠吉期待 IPE 這門新興的學科應可包括經濟史、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經濟社會學以及國際關係等等學科，而做爲一門「祖父級」的統整性學科，多學科的視野將有助於避免對實際狀況的錯誤理解 (Strange, 1984: 7)。

同時 IPE 這門學科也不應急於建構理論模型，它應先作爲許多學科交會與對話的場域，甚至只要能讀寫的一般人都可以接近，有如早先美國西部大草原開放給所有的移民者開墾一樣，充滿著各種可能性與希望 (Strange, 1984: 4)。IPE 的研究只需在最低的限度上達到基本的共識即可，從近來 IPE 研究相關文章大量地增長，或是從國際關係研討會針對特定議題的討論，事實上已反映了 IPE 已經有它獨特的研究領域 (area of investigation)，即對於全球範圍治理 (governance) 問題的關注，包括國際貿易、外債、多國公司、環保以及軍事安全等等議題的治理。這些議題正是 IPE 這門學科的共同核心所在，並可在此基本共識上建立 IPE 的學術社群 (Susan Strange, 1995: 157-158)。

從上述史翠吉的 IPE 學術立場來看，其所牽涉的是整個社會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問題。作爲社會科學一部份的 IPE，同樣

必須面對的問題是，該如何避免成爲雜七雜八的私人觀點，其中每一觀點都同等有效而造成知識的零碎化？或者 IPE 該如何追求一種有意義的客觀性程度，同時能避免淪爲政治上或學術上擁有強大權力者的論述？如果依華勒斯坦等人的「重建社會科學報告書」之意見，將客觀性看成是人類相互學習的結果，學者間不論其所採行的研究方法爲何，都是竭力地想說服對方相信自己的發現和解釋的有效性，他們將自己的解釋交付給所有對特定主題進行研究或系統思考的其他人，供其在一種主體間（intersubjective）的脈絡中做出判斷（Wallerstein, 1996）。也就是說，這是一種透由有組織的主體間溝通方式以達客觀性要求的作法。據此，我們可以發現史翠吉的意見倒是蠻符合這種客觀性要求的，首先她建議 IPE 學者間對研究議題有基本的共識即可，至於該如何研究則應持開放的態度，尊重不同學派的意見，同時反對偏向「國家中心主義」與「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研究方法，主張多元學科對話的立場，這些都有助於增進獲取更客觀知識的可能性。同時爲了 IPE 學者間能作有焦點的對話，史翠吉也建議回歸價值本質與道德哲學層次的思考，而自己更提出了 IPE 的結構權力分析架構以取代吉爾平的三種意識型態綜合說法，這正是一種追求社會科學客觀性要求的 IPE 研究嘗試。

當然史翠吉的貢獻主要在於對主流的 IR 或 IPE 研究提出了反省與建議，但其並未提出自己明確的本體論或認識論立場，常是點到爲止而已。例如，史翠吉強調道德哲學的思考以避免 IR 或 IPE 研究陷入意識型態爭議或偏向「國家中心主義」的弊病，但所謂的「道德哲學」究竟是指回歸十八世紀蘇格蘭啓蒙運動思想家-如亞當斯密等人-對於道德與利益關係之研究？或者是指新馬克思主義者-如葛蘭西-所主張的實踐哲學，認爲問題的提出與回答不應限於經院內所做的學術性探究，必須尊重人民群眾由下而上的表達看法，正如葛蘭西所言「一切人都是哲學家」？在這兩者之間史翠吉的立場並不是清楚的。同樣地，史翠吉認爲國家與市場的互動關係是存在於四個權力結構（包括生產、安全、金融與知識）之中，這種看法是比吉

爾平的綜合學說將國家與市場的互動關係與其所依存的市民社會或者權力結構割離開來的看法進步許多，但史翠吉也未進一步說明其是指一個結構的四個面向，或者是四個相對獨立自主的權力結構，如果是前者則該結構的本質內涵為何？如果是後者則四者之間的關係又為何？此外，知識權力結構的「知識」是指技術生產層面的知識，或者是指文化霸權的概念也是不清楚的。這些問題的產生或許是由於史翠吉主張折衷主義的研究態度所造成的，折衷意味著妥協與包容，但卻也容易導致立場不明或搖擺的問題。然而這也無損於史翠吉對於 IR 或 IPE 研究的貢獻，正如其所言，問題的提出與尋求共識比問題的回答更重要。

肆、結論

政治經濟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之間的關係是密切的，至於其密切性的方式與程度則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與評價。本文主要從當今對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三大類方式著手，來探討其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關係，然而這也僅是許多可能觀點中的一種。此外，本文並未涉及深刻的方法論或本體論問題，毋寧更像是一份個人的研究綱領或心得。這篇文章僅是此研究議題的引子，經由更多的溝通對話才能有助於 IPE 的學科發展。從上面的討論過程中至少可以得出下列幾點有關政治經濟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之間關係的結論：

- 一、政治經濟學中的三種不同意識型態研究途徑，包括經濟自由主義、經濟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沿用到國際政治經濟學時就產生了相對的三種意識型態研究的變種，即新自由主義的互賴理論、新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理論以及新馬克思主義的依賴理論、依賴發展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然而這樣的沿用並非僅是政治經濟學三大學派的簡單機械式的放大，而是一種新的綜合。如互賴理論試圖結合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的觀點，而依賴理論、依賴發展論以及世

界體系理論等則是結合現實主義（或民族主義）的權力觀點與馬克思主義的結構觀點。此外，理論的爭議不僅發生於學派之間，也存在於學派之內，如同為馬克思主義學派的依賴理論與對其進行修正的依賴發展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之間。

二、從近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來看，IPE 的議題理論愈來愈難歸納為三大學派之一，反倒是應該說針對不同的議題都可能存在著三大學派的觀點。例如，霸權穩定論涉及不同學派，從自由主義的觀點來看，全球經濟管理中的「搭便車」問題要求一個霸權來提供國際公共財，而霸權應表現得非自私，也就是所謂的仁慈霸權。而新現實主義則認為霸權的興起是大國間政治競爭的結果，當霸權衰落時，保護主義或經濟民族主義會重新抬頭，霸權的存在只是說明了國際政治的競爭特性與戰爭的原因。同樣地，國際建制理論的研究也涉及三大學派。雖然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如基歐漢等人，以新古典的研究方法來發展新自由制度主義國關理論，相信人類理性能力，認為國與國之間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裡，經由建制的過程能夠進行合作而互蒙其利。然而一些現實主義的學者認為國際體制的原則、準則、規則和決策程序根本上是權力關係的反應；而另一些新葛蘭西學派的學者則認為，國際建制的內涵與功能是由國與國之間相互主觀互動而建構的產物，而其背後則可能牽涉到「文化霸權」的支配作用。因此，很難說霸權穩定論是全然的屬於新現實主義觀點，而國際體制理論則是新自由主義的觀點。IPE 研究常見的情況是，針對不同的研究議題可有三種不同的觀點。如此，我們應該關注的問題反而是，誰在主導議題的設定？討論的議題和誰的權力有關？我們可以發現七〇年代的霸權穩定議題、八〇年代的後霸權國際建制議題以及九〇年代的全球治理議題等等，主要還是圍繞著美國的國家利益或其國力的興衰作研究。

三、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不論採用吉爾平的三種意識型

態研究途徑的綜合說法，或者採用基歐漢等人以經濟學方法來研究國際政治，都存在著問題有待解決。前者可能產生三種意識型態彼此間淪為各說各話的情況，而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又有國家中心主義的傾向；而後者則有可能陷入所謂的「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狹隘思維。爲了讓 IPE 的研究更加周延，學者間有更多的對話空間，歐洲學者史翠吉提出所謂的折衷主義觀點，認爲 IPE 研究不必急於找答案，只要對研究議題有基本的共識即可。同時她亦主張增加「價值敏感度」的體認與重視道德哲學層次的思考，並且 IPE 這門新興的學科應作爲多元學科交流對話的場域。此外，她也提出結構權力分析架構以取代吉爾平的三種意識型態綜合學說。史翠吉與主流的美國學者間之爭論所反映的問題是，IPE 這門新興的學科在研究方法上如何可能達到社會科學研究的客觀性要求。然而史翠吉雖然批判主流 IR 或 IPE 的研究患了「國家中心主義」以及「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毛病，也汲取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如結構性的權力概念，但仍然是採用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這也難怪古吉尼（Guzzini, 1998: Chap.11）要將史翠吉歸爲國際關係的新現實主義學者。

四、無論政治經濟學或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均不能忽略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特別是其國家理論部分，國家理論可以是 PE 與 IPE 之間一個很好的溝通橋樑。政治學在五〇及六〇年代由於受到行爲主義研究革命的影響，以政治系統取代對國家的本質研究，注重決策過程的輸入面向而忽略政治體制（political regime）的關注。此外，以理性選擇理論爲首之政治的經濟分析途徑，將政治視爲經濟計算的場所，政治成爲從屬於經濟的工具性地位，如此國家本身的研究就不見了。這要等到七〇年代以後，由於受到新馬克思主義有關「國家相對自主性」問題研究的影響，在政治學裡興起所謂的「將國家帶回來（bring the state back in）」的學術研究風潮，在這種氛圍底下政治經濟學作爲一門新興的學科才有可能健全發展，也才可能豐富地討論國家與市場

間的互動關係。同樣地，國際關係研究在二次戰後至七〇年代以前這段期間，也由於受到行為主義的影響而往博弈理論或系統論的方向發展，而少有跟馬克思主義學說對話，事實上這段期間新馬克思主義學說，如依賴理論、依賴發展理論以及世界體系理論，已經發展起來了。甚至當今主流的國關學者在作歸納時仍將所謂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第二次大辯論，鎖定在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論辯。然而這兩種主流理論均採用「國家中心主義」的論述方法，對國家的看法乃先驗假設其為合一整體的理性行為者，在無政府的國際社會裡會追求客觀存在的國家利益。這種立場最大的問題乃是，認定國家相對於國內的市民社會擁有絕對的自主性。事實上國家的本質與功能或者國家利益的內涵均是由市民社會建構形成或定義的，國家頂多僅享有相對的自主性。毫無疑問，新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有助於對傳統主流國關理論中的國家概念進行深刻的反省，並且提出新的理論見解。我們可以發現八〇年代後期以來，包括世界體系理論、新葛蘭西學派以及歷史社會學派等等在內的新馬克思主義學說被歸為批判理論，與其他實證國關理論並列，展開和主流的實證主義理論進行所謂的國關理論研究第三次大論辯。

參考文獻

- 柳劍平 (1998) <「國際經濟政治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歐洲》，第2期，頁12-18。
- Caporaso, James A. & Levin, David P. (1992). *Theorie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x, Robert W. (1995).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in Hettne, Bjorn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Fernwood Books.
- Crane, George T. & Amawi, Abla (Eds.) (1991).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 Frieden, J.A. & Lake, D. A. (1995).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 Gilpin, Robert.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Press.
- (1975). *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 Guzzini, Stefano (1998).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 Nye, Joseph Jr. (1979).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he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Krasner, Stephen (1996). "The Accomplishment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Smith, Steve., Zalewski, Marysia and Booth, Ken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urphy, C. & Tooze, R. (1991). "Introduction" in Murphy, C. & Tooze, R. (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Olson, Mancu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iker, William H. (1962).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nidal, Duncan (1985).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9. No.4 (Autumn) pp 579-614

Spero, Joan Edelman (1990).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Staniland, Martin (1985). *What is Political Economy?: a study of social theory and underdevelop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trange, Susan. (1982). "Cave! Hic Dragones: A Critique of Regim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6, No.2 (Spring) pp 480-496.

----- (1983). "Value and Risk in the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Jones, R. J. B. (Eds.), *Perspective o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Francis Pinter Publishers.

- (1984) . “Preface” in, *Path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Allen & Unwin Press.
- (1988) . *State and Marke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rinter Publisher.
- (1995) .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Booth, Ken & Smith, Steve (ed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1996) .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ig, Norman J. (1985) . “Introduction: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Vig, N. & Schier, S. (eds.) , *Political Economy in Western Democracies*.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Press.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 .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 :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1983) . *Historical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Press.
- (1984) .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 - economy : 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ds.) . (1996) .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劉鋒譯：
《開放社會科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From Political Economy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Yi-Ren Dzung*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Firstable, the author defines the meaning and context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This study also discusses to what extent can the research method and approach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be applied to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eanwhile, the author has a deep discussion on the issue of what might be the problems caused by these applications . In sum,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hould not be the simple extension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has developed its own speciality.

Key words : Political Economy 、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Statist Theory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of th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